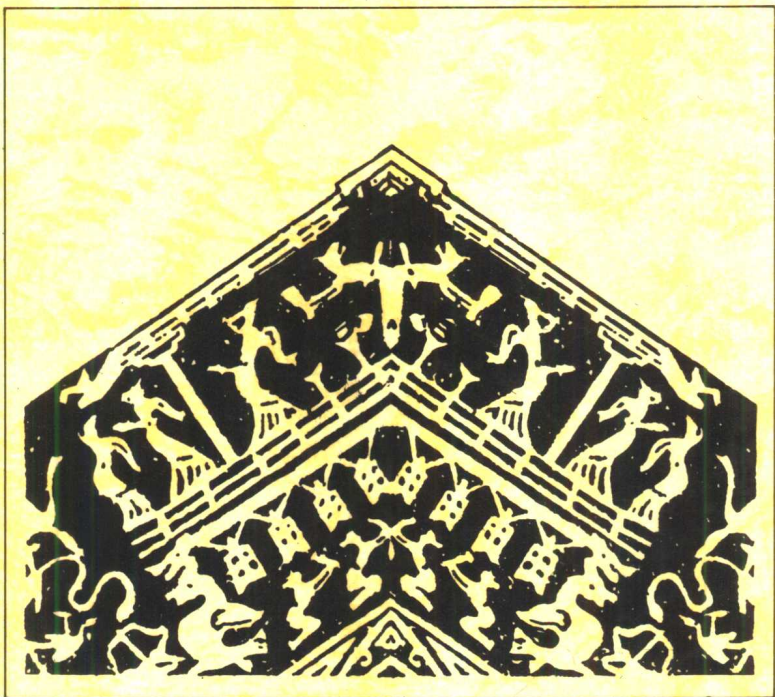




大學用書

教育人種誌研究方法論

曾守得 編譯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大學用書

教育人種誌研究方法論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Educational Ethnography

曾 守 得 編譯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語文教育系副教授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印行



ISBN 957-11-0007-2

教育人種誌研究方法論

中華民國 78 年 9 月初版

編譯者 曾 守 得

發行人 楊 榮 川

發行所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局版臺業字第 0598 號

臺北市銅山街 1 號

電話：3916542

郵政劃撥：0106895-3

印刷所 茂榮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板橋市雙十路 2 段 46 巷 22 弄 11 號

電話：2513529

基本定價： 4.45 元

(本書如有缺頁或倒裝，本公司負責換新)

ISBN 957-11-0007-2

譯 序

教育是真理與經驗的再實踐，也是一種理想的文化累積方式。論常理，它應該是人生理想的催生者。但是，近年來，教育逐漸趨向於講究實效，這是近二十年來國內大幅度社會變遷的前因與後果。說它是前因，乃是因為我國的教育制度造就了無數的人才，雕樑畫棟，蔚為國用；說它是後果，乃是因為我國的社會變遷，又回過頭來帶動全面的發展，使國人更加重視教育造就人才的功能。

然而，在一切講究實效的社會，來自四面八方的期望，往往扭曲了教育的本質。小自幼稚園、國小階段的所謂「才藝補習」填鴨教育，及國中、高中（職）階段的升學競試，大至大專階段的就業、進修，與留學競爭，幾乎所有父母與師長，無不期望其子弟考試一帆風順；於是，造成一股社會重利至風，凡是能夠順利通過層層考驗者，必可揚眉吐氣，名利雙收，一舉成才；不幸落第者，只好再接再勵，捲土重來。許多國人甚且把十多年青春毫不吝惜地虛擲在準備考試的歲月裡，載浮載沉。在教育當局痛心疾首呼籲減輕學生課業負擔的同時，強大的社會輿情（校長、師長、家長、親友的殷殷期望），却又從另一方面來加重學生的負擔，造成教育問題益增沉疴，幾達藥石罔效的境地。

在此種情況下，僅從教育的成效（學生的學習成就、課程編排之得失、教材教法能否妥當運用等）來探討教育問題的解決之道，無異緣木求魚。我們需要更多的社會文化背景知識，把圍繞在教育情境的核心——教室——及其周圍的人、事、時、地、物等因素，皆納入觀

察、探討、與分析的範圍，才能把問題的癥結理出一個頭緒來，對症下藥，才有治癒的希望。就在這種因緣際會裡，教育人種誌的前途才更顯得光明。

顧名思義，教育人種誌源自人類學的研究。人類學的研究目標是探討人類羣居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民俗、禮儀、生活方式，及民族特性等的學問。在教育的領域裡，人類學的研究皆偏於文化人類學的範疇，它們不外乎教學環境，及其周遭的人、事、時、地、物等文化內涵。譬如，當教育人員研究中學生次文化的真象時，他們必須深入探討其學校社區、師生與同儕間之人際關係、師長與家長的期望、兄弟姊妹交互的影響、親友的期許、自我能力的評估與人生目標、同儕壓力、家長的社會經濟地位、民族性語言與互動的常模等等。如果重點在研究學生的學業成就，那麼除上列因素必須考慮外，還必須詳細觀察分析教師的注意力、教材教法的運用，及其全部教室上課的過程。

環顧國內，近一、二十年來，教育研究偏向量化的研究。這種量化分析法，固然極具說服力，但是在其取材過程中，難免只重某一時期的成就數量，而輕忽其所以達到該終端行為的整個過程。因此，量化的研究，通常治標有餘，而治本不足。換言之，量化的教育研究，在診斷某階段教育過程的疑難雜症，可能游刃有餘。但是，欲對其教育過程做有效的針砭，却常感無能為力，或成效不彰。此種情形，可以從我國改進大學、高中（職）、五專入學考試只聞建議的呼聲，多年來未見具體有效改進措施出現，即為明證。

譯者一九八二年夏負笈美國費城賓大語文教育研究所，浸淫人種誌研究數載，鑑於國內教育人種誌的專書鮮見流傳，其有限參考資料也鮮見問世，即便或見，也僅在人類學界流傳，教育界的有心人士也

望其外文原著難以消化運用而却步。因此，譯者不揣冒昧，特選譯八篇有關教育人種誌研究方法論的論著，為國內教育人種誌研究，添畫一份遠介的心力。這八篇文章分別是：

第一篇：「何謂人種誌？」（“What's Ethnography?”）（Hymes 1980）。

第二篇：「教育人種學」（“Educational Ethnology”）（Hymes 1979）。

第三篇：「教育人種誌：基礎要件的界定」（“Ethnography in Education: Defining the Essentials”）（Heath 1982）。

第四篇：「人種誌法學校研究的標準」（“Criteria for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to Research in Schools”）（Wolcott 1976）。

第五篇：「在『黑盒子』裡——教室語言學習的研究方法問題」（“Inside the ‘Black Box’: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lassroom Research on Language Learning”）（Long 1983）。

第六篇：「從會話中淬取社會文化知識」（“The Retrieval of Sociocultural Knowledge in Conversation”）（Gumperz 1984）。

第七篇：「畢其功於一役：研究溝通本領發展的人種誌法」（“Getting It Together: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Schieffelin 1979）。

第八篇：「在脈絡中研究：英語教育的人種誌研究」（“Research

in Context: Ethnographic Studies in English Education”) (Kantor, Kirby and Goetz 1981)。

這些文章中，第一篇至第四篇為基礎方法論，簡介人種誌的一些基本概念、研究技巧，以及一些比較客觀的評量標準。第五篇至第八篇為實例論述，是現今教育人種誌研究法比較常見的應用領域。它們分別是第一語言（亦即母語）學習（第七篇）、教室語言學習（第五篇）、會話分析（第六篇），以及英語文教育領域（第八篇）。本書所選譯的專業領域，僅限語文教育部份，乃因譯者專精偏限所致。教育人種誌法適用範圍，自不在此限。惟限於篇幅與譯者才疏學淺，不克一一明列迄譯，請讀者海涵。

譯者有感於譯事繁冗，復囿於平日授課負擔繁重，深感心餘力絀，文成匆促，謬誤之處恐怕難免，尚祈方家先進不吝賜正。

最後，本書之所以能够順利付梓，筆者除感謝恩師 Dell Hymes 博士、Bambi Schieffelin 博士、William Labov 博士、Nessa Wolfson 博士、Teresa Pica 博士、Nancy Hornberger 博士等辛勤教誨外，在此特別感謝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楊董事長榮川先生能够不計成本，慨允出版，並造福後進，銘感五內；同時編輯曾文娟小姐耐心編校，始能體例一貫，完美無缺，在此謹致深深的謝意。尤其，承蒙好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所教授王文科博士長期鼓勵與照顧，更是沒齒難忘；沒有文科兄的大力督促，極力美成，本書將永無面世的機會。難得的是，內人郭素蓮女士，除協助校對外，照顧內外，備極辛勞，尚須忍受我一切冷暖悲歡，休戚與共；吾兒中岡、中斌尚知乖巧，頗能體諒爸爸鐵面無私的訓斥，於心不忍，特此一併誌記，他日補償。

曾守得 謹識

目次

第 1 篇	何謂人種誌?	1
	(<i>What's Ethnography?</i>)	
第 2 篇	教育人種學	23
	(<i>Educational Ethnology</i>)	
第 3 篇	教育人種誌: 基礎要件的界定	33
	(<i>Ethnography in Education: Defining the Essentials</i>)	
第 4 篇	人種誌法學校研究的標準	79
	(<i>Criteria for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to Research in Schools</i>)	
第 5 篇	在「黑盒子」裏: 教室語言學習研究 的方法問題	123
	(<i>Inside the "Black Box":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lassroom Research on Language Learning</i>)	
第 6 篇	從會話中淬取社會文化的知識	187
	(<i>The Retrieval of Sociocultural Knowledge in Conversation</i>)	
第 7 篇	畢其功於一役: 研究溝通本領發展的 人種誌法	209

	<i>(Getting It Together: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i>	
第 8 篇	在脈絡中研究：英語教育的人種 誌研究.....	263
	<i>(Research in Context: Ethnographic Studies in English Education)</i>	
索 引		301

第 1 篇

何謂人種誌？

(What's Ethnography?)



Dell Hymes 原著

原文刊於：D. Hymes (ed.) (1984) *Language in Education: Ethnolinguistic Essays*.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88-103.

I

「人種誌」(Ethnography)在教育上廣受討論。我們常常聽到諸如「何謂人種誌」之類的問題。美國國家教育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已經責成專門委員會對此問題提出答覆。這種答案對一個人類學家，特別是對一個對此一話題的沿革感到興趣的人來說，可能充滿困惑。假使追溯人種誌所引導的歷史軌跡，我們真的可以回溯到幾百年前古地中海的世界，以及該地人種誌探究的短暫興衰，其中以赫羅多托斯(Herodotus)最有名，不僅是一個最佳的例證而已。僅就南北美洲而言，我們可以追溯人種誌研究報告相當連貫的歷史，自從發現新大陸以來，一直與人種誌問題的提出互相輝映。在實際的田野研究裏，不論是一般或特殊的技巧，或近來的倫理

道德方面，都有不少現代的文獻存在。最近有一本討論我們自己社會的人種誌研究（Spradley and McCurdy 1972），據我所知，已經被作文老師用來當做刺激學生作文題目之用。假使人種誌研究在教育上對某些人充滿新穎，對世界上來說它却真的一點也不新奇。當被詢及「何謂人種誌」時，提供一張短短的書單不就足夠了嗎？或者指出一般研究計畫所謂的「標準人種誌研究法」本文內的某些討論不就足夠了嗎？

恐怕未必。人類學家本身對人種誌本身就沒有一個統一的概念。尤其是他們對人種誌與研究我們自己的社會組織（像教育界）之間的關係，更沒有一個完整的概念。並且，人類學家也仍然難以接受或完美地針對他們認為人種誌的研究模式與其他研究（像我們自己社會的研究模式）加以統整。因此，蛻變中的人類科學知識情境，總體上說，引介許多新問題與歧異的根源。

教育研究早已受到研究的量化與實驗觀念所支配。人類學家輕而易舉地以不同的說服方法來批評這種方法。但是，要他們精確地提出其他變通方法，卻又很難。「人種誌」不能被認為已經完整，隨時可以像匣式裝置一樣，在知識的觀念與研究長久相異的社會組織實作和目的上，隨時可以插入待用。假使沒有慎重考慮其內在觀念和完整地注意其差異，「人種誌」在教育研究上可能很難持久。甚且更糟的是，部份或迷信的觀念會加以取代。

晚近對人種誌感到興趣的真正機會，是進入人種誌學者與教育研究主持人互動與調適的相互關係中。此種關係將改變二者。基於我的人種誌觀念，我覺得在此種期望之下，對民主的生活方式將有所收穫。下列簡述之提出，係因為我並不知道其他類似企圖，特在此扼要地考慮這些問題。許多其他人則以其本身之經驗與外表來貢獻。

I

「人種誌」的概念有一個困難是它像一個多餘的範疇。它跟研究非我族類結合在一起，而且與使用實驗設計法與量化評量法以外的方法結合在一起。

顯然，並非所有非上述二者以外所有的東西都是「人種誌」。但是，欲對它下一個正面的定義却不容易。這種困難的一個主要理由是，好的人種誌研究是經許多不同的人完成的，有些是早在訓練他們的專業發明之前就已經出現了，而且專業訓練幾乎已經變成經個人經驗，傳遞從做中學習與手藝的事情。

對某些人來說，所謂人種誌似乎是個人心理經驗，對非知識的發現，毫無助益。

顯然，人種誌研究包含參與和觀察。什麼才算人種誌？有那些種類的人種誌？假如我們考慮什麼東西造成參與和觀察系統化——也就是說，什麼東西才算系統化的人種誌，那就很容易明瞭了。

最早期我們認為重要的人種誌研究作品，通常具有「綜合性（comprehensive）」系統化的性質。的確，任何所有早期的旅遊者、傳教士、政府官員、及其他類似人員的描述，凡是可以提供世界上各民族文化的資料與看法者，都因它所提供的東西而受到歡迎與收集。但當我們單獨提出卡單（Ibn Khaldun）或沙哈甘神父（Father Sahagun）時，那只是因為他們二人是比較早期而且比較綜合性的。他們的好奇並不僅限於好奇事物；他們對收集資料並且對解釋一種生活方式的廣大範疇感到興趣。

大部份早期使人種誌研究變成一套完整過程的努力，都呈現綜合

化的意願。這些企圖是做觀察時探討的指引、系列的問題。當歐洲對大部份非西方世界尚未明瞭多少之際，當不同的科學、宗教、實際的理由刺激某些人尋求更妥切知識之時，他們刻劃了一個歷史的時期。這些研究指引，雖然涵蓋面不等，但都對一種生活方式的全面，具有共同的關注：某地方某種人像什麼樣子？

前不久，我們才有一些完整的過程可以區分為專題導向（Topic-oriented）。誠然，培帝爵士（Sir William Petty, 1623-87）的研究與專書 *The Domesday Book*（譯者註：該書係研究賓州印第安人土著在十七世紀末期生活習性的論著。）具有這種特性。最好的美國例子是，摩根（Lewis Henry Morgan）在十九世紀中葉記錄親屬名稱的問卷。此時值得我們暫停下來考慮摩根宏論的幾個層面。首先，他有一個對比或比較性質的觀點：從他與伊洛魁族印第安人（Iroquois Indians）相處的經驗，配合他古典希臘的知識，他了解到有一種親屬組織的原則，形成與當代的美國人與歐洲人熟悉者鮮明對比的現象。然後，他試着去尋找親屬系統的主要類型，與他們在全世界的地位。第二，他需要系統化的資料，除非他自己尋找才有的資料。因此，他遊遍美國西部，並與可以協助他的人不斷的書信聯絡。第三，他利用他的發現，先是形成一部歷史的解說（*Systems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 1870），然後再寫成一部演進的解說（*Ancient Society*, 1877）兩本專書。二者對整體人類發展做了最普通的解釋。

這三方面的探討，似乎為普通人類學研究的基本成分，有別於人類學本身的探討。每一方面都可單獨存在——一個對比的看法、一批特殊資料的搜集、和一個一般的解說。一般泛稱人類學僅存在於此三者聯合成的一個共同體。人種誌研究絕不僅是一種多餘的技巧，而是

一個基本方法的名稱，當三方面結合成一體時的名稱。

不少人種誌研究可以稱得上「假設導向」(hypothesis-oriented)的時代已經來臨。可以確定的是，摩根有一個普通的假設。但是，區別懷丁夫婦(John and Bea Whiting)所引導策劃來研究不同社會中社會化過程的人種誌研究，似乎也是合理的。懷丁夫婦試圖達到一般的結論，在一個理論基礎上，從當時已經存在的文獻上去測定假設。像許多人一樣，他們發現他們的問題，比現有文獻能夠回答的東西還要特殊。資料來源並未詳述其目的，也不夠具比較性質。因此，他們策劃一個研究專題，來提供他們所需要的，詳細而且可以比較的資料。人種誌研究隊(通常成雙成對)接受社會化田野研究的引導訓練，送往許多不同社會的現場一段時間，在整個田野研究中保持書信的聯繫，然後回來撰寫他們的結果。(懷丁太太(Bea Whiting)的「六種文化」(*Six Cultures*)就是一個主要的產物。)像摩根一樣，懷丁夫婦具有比較社會類型的看法，收集特殊資料的需要，和一個普通的理論框架(在此例中指心理動力的理論)，其中對照與特殊的東西彼此關聯。

今天，人類學中，這三類的人種誌研究繼續並存。我們仍然偶而會發現一些未為人知的民族(像幾年前，在菲律賓發現的一樣)。對這些新發現的人類，綜合性的資料必須經由進一步發掘來提供。也仍然有許多民族，有關他們的知識一直未能妥貼地加以系統化，因為有關他們的知識有許多嚴重的鴻溝。新穎的人種誌研究可以充當結合所有已知資料第一手知識的基礎，或者充填已知資料鴻溝的知識基礎。

目前，仍有許多文化層面的發現，或對文化觀察的發現提出，因而使現有文獻無法提供太多資料。語言人種誌(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就是一個現例。人類關係區域檔案(The 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雖有豐富的人種誌研究的資料，却並未涵蓋多少語言的文化類型資料，更不必提基本理論問題和社會語言功能方面的資料了。（人類學理論認為語言功能四海一同是理所當然的。）當此一發現或觀察出現之後，必須採行以專題為導向的人種誌研究。一旦從新觀點來探討不同文化時，我們需要尋找文化編類範圍內的一些東西。

綜合性的人種誌與專題導向的人種誌二者都會趨向假設導向的人種誌。假如有一定數量的文化知識，就可以策劃精確的探討。誠然，假設導向的研究仰賴綜合人種誌的存在，甚且只有在後者存在時，才有可觀的豐收。而且，一旦某一文化層面類型範圍內的某些東西揭曉之後，我們才可以形成更精確的研究問題。研究可以顯示「直接」與「間接」語體對比的重複出現，但是這二種語體的屬性，在每一個個案中是否相同？功能是否相同？在現今語言人種誌裏，我們熟悉廣義的對比，通常以二分法出現（請參考 Bernstein 的「沿伸」（elaborated）與「限制」（restrictive）語言（codes））。我想，這個事實是一個專題導向時期的確切指標，而且也標明了邁向假設導向時期的需要。

III

在此情境之下，美國教育的情況如何呢？顯然，我們手上已有不少資料。但是我們不清楚，這些資料之取得與分析是否全部依照允許所有可能的教育觀點。假如學校也像親屬系統或從語言的觀點來加以考慮，第一個問題將是：有那幾種學校？假如事實上這個國家包含許多不同類型的學校，那麼光是知道原則上各校測驗分數的起落，似乎

是不夠的。同理也可以用於一個城市或地區。例如，費城第一學區的學校是否全部相同？假如不同，到底有多少種？可能在任何層次的考慮上，我們不想說所有學校都相同，也不想說每一個學校各具不同的特色。總括言之，我們會承認一個分類的問題，成為分析的中心。

有用的分類，必須以特殊的目的來設計。親屬對社會生活很重要，但是縱然如此，依親屬關係來對社會加以分類和分析，也與依宗教來對社會分類和分析不盡相同。他們在一種生活方式的不同層面上有密切關聯，但是此種關聯不是一成不變的；而且也因此，在學校的許多不同層面上，也是如此。以語言能力對第一學區內的學校加以分類，問題涉及識字情況（literacy），不一定就是為了其他目的而分類的正確分類法。相反地，這裏有一個基本要點：為了其他目的而作的分類，也不一定會對語言能力產生關注。

這個基本要點是一個一般考慮的例子，用來區分許多人種誌學家與實驗模型，至少他們應該瞭解該模型。對許多人種誌學家來說，此方法的實質就是一種辯證法（dialectical method），或回饋（或互動—調適）（feedback or interactive-adaptive）法。基於此種方法的本質，在探究的過程中，基本問題可能會改變。我們可以開始時假設，每一社區都必須有一個新婚夫婦住家的類型，該類型可能為四種大類之一，但是後來，我們發現我們所研究的社區，實際上是基於我們看不見的原則來決定新婚夫婦住家的型態。（這是一個實際的例子，參見古殷納（W. Goodenough），「居住規則」（“Residence Rules”（1956））。

人類學史充滿此種經驗。普通人類學研究的任務，一部份可以說是為了協助克服單一文明部份觀點、對人類生活範疇與瞭解的限制。對許多人種誌學家來說，人種誌研究有一個基本的特徵，那就是：在